



加快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 李 舒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这是国家积极应对互联网快速发展给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厚植数字时代文化自信的高度，对国家文化数字化作出的战略部署。

中华文明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从古今汉语到各少数民族语言，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草行楷，从龟甲兽骨、竹简绢帛、纸张到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新文化运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文化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以数字化赋能文化发展，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华文化的全景呈现、全民共享，还可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文明优秀创新成果的海内外传播。

以数字化推动中华文化全景呈现

对中华文化的全样本记录。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文物、古籍、美术、地方戏曲剧种、民族民间文艺、农耕文明遗址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数字技术，对包括文化数据源和文化实体在内的文化资源进行数据采集、加工、挖掘并提供数据服务，有助于全面汇集文化数据信息，实现对我国文化资源全阶段、全地域、全形态、全内容

的整合，形成对中华文化轮廓的通史性、全景式认知，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重要精神支撑。

对中华文化的全样态展示。传统文化的弘扬、创新必须以传承为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只存在于博物馆中，要让数字时代的年轻人了解并喜爱传统文化，首先得让他们看得见、看得懂。深入推进文化数字化，通过文字、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运用VR、AR、全息等数字技术，可以具象化、立体化地全样态展示中华文化瑰宝，使中华文化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存在。近年来，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思维的加持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样态更加鲜活和时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类节目不断创新，陶艺、雕漆、缂丝、制瓷、竹编、刺绣、榫卯等非遗技艺借助短视频传播获得大众的广泛认知，以及线上线下体验京杭大运河，“云游”敦煌、故宫、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参与三星堆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等体验式文化活动，都激发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让中华传统生活美学和工匠精神焕发时代价值，让静态文化成为可观、可感、可触的活态文化。

以数字化推进中华文化全民共享

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全民共享。党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文化改革经验，十年磨一剑，将文化数字化从“建设工程”上升为“国家战略”。2012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包含了文化资源、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数字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和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将文化数

字化上升到战略层面。2022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是全面落实文化数字化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提出了关联形成文化数据库、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等8项重点任务。事实证明，只有准确把握数字时代的历史机遇，以前瞻性、战略性思维进行全局谋划，才能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方位、确保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文化发展成果。

完善基础设施，保障全民共享。尽管我国已于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不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尚存在较大差距，文化公共服务的供给在数量、质量和均衡性等方面均有待提高。《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国家文化专网、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具有云计算能力和超算能力的文化计算体系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成，将大大弥合地区间文化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的鸿沟。这是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将推动共同富裕迈向新的阶段，赋予其文化共同富裕的深层内涵。

丰富内容供给，落实全民共享。如果文化产品的种类是单调的、内涵是贫瘠的，那么，再公平的供给也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全民共享，因此必须提升高质量文化公共品的供给能力。一方面，要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培育一批新型文化企业，鼓励运用数字化手段创新文化表现形态，进一步激发数字内容产品的产能；另一方面，要为文化内容产品的流通创造条件，推动文化资源数据转化为可溯

源、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使文化数据的分享交易机制更加完善，运行更加顺畅。

以数字化拓展中华文化全球影响

以数字化强化对中华文化的全维度阐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除了有形的文化载体，中华文化还包括经过历史沉淀、淬炼下来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无形的精神财富。运用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无形的精神财富的有形传播，这个由抽象到具象的转化过程实质上也是提炼中华民族思想和精神内核、阐发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的过程。通过对中华文化精髓的全维度阐发，对内有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对外有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使包括制度成果在内的中华文化在深入鲜活的阐释中增值，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生。

以数字化推动中华文化的全媒体传播。文化的传承、传播离不开媒介，媒介与文化的发展相伴相随。数字化进一步增强了媒体跨越物理时空的能力，使得媒体超越了传统的报刊、图书、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经过数字化升级，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舞台、建筑、景区等都可以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媒体，从而大幅提升中华文化的海外触达率。同时，全息呈现、数字孪生、多语言交互、高逼真、跨时空等数字化技术还提升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效果，丰富了公众的文化消费体验，有助于培育更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IP，推动中华文化优秀成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开启“红绿灯”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发展

□ 潘 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地位，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要清醒认识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手抓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一手抓好监管规范，切实防范资本平台的野蛮生长和市场垄断问题。

开启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战略布局的“绿灯”

强化数字化的生产平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和传统产业链生产效率。目前传统生产制造业亟须通过产业数字化实现转型升

级。产业数字化过程就要求生产制造类企业从生产环节入手并延伸到产业链条各个环节并嵌入数字化的各类服务，如金融服务链路、智能化采购链路、售后服务链路等，以此把工厂内部的自动化转变成工厂之间的数字化，最终提高全产业链生产效率。

优化数字化的消费平台。零售新时代已经到来。以电商为主的数字化消费平台所蕴含的新的交流、交易模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模式和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推动力。我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网络零售国，随着生物识别技术、AR购物、云货架、无感支付、智能试装镜等前沿技术日趋成熟，零售新场景和新体验快速演化，商业零售呈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高端超市+生鲜餐饮”的新业态已经形成，亟须优化数字化消费平台的资源配置。

细化数字化的服务平台。首先，实现线下流程的线上化。通过数字化将线下流程和内容转到线上，让传统服务业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连接特点实现规模化提升。其次，还要重构服务场景。传统服务行业数字化过程本质上就是通过重构服务内容来提高服务效率。通过产业数字化，传统服务企业可以嵌入多平台和多场景，如金融

服务可以嵌入到支付平台、电商平台、租房平台、售车平台、出行平台等，从而实现个性化与规模化结合的商业模式。

深化数字经济管控平台。产业数字化一方面激发了创新、提高了效率、拓展了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也会集聚资本、加深数字鸿沟等。因此，发挥数字经济平台促进资源配置积极作用的同时，要深化数字经济平台的监管规范，积极探索构建在创新、税收、反垄断、国际规则、信息技术风险与安全等方面的数字经济管控规则体系。

设置规范数字产业化运行秩序的“红灯”

抓住数据所有权。数字产业化最关键的“资本”是数据的所有权。互联网因其数据的快速复制性，导致没有“所有权”的概念，因此要让数据生产者拥有数据的所有权，同时还要拥有一定的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数据的采集者和服务提供者拥有收益分配的优先权，以此鼓励对数据的采集、治理和服务行为。同时，还可以利用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等特点建立一个第三方组织来承担数据的储存、供给等工作，该组织对所有数据均没有

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

加强“大数据”算法治理。一是利用大数据进行监管。从过去的分布式监管，向利用算法进行数字化监管转变，即只监管数据、通过数据进而监管其他。在监管的过程中，通过区块链把数据“控”起来、“算”出来，再逐层向下延伸。二是对算法本身的监管，随着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广泛应用，算法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也要看到算法对社会治理带来相应的冲击和挑战，算法黑箱、算法歧视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加强对算法本身的监管，也是“大数据”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

促进透明式监管。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伴随着个人信息泄露、算法歧视、科技伦理等一系列问题。其解决途径不能靠人管算法，而要靠算法管算法，要以算法为核心建立数字经济的透明监管制度。通过加强非经营性数据的共享，规范企业的同质竞争及数据的无原则采集，探索个人数据中立托管等多模式应用，提高监管透明度。



社会上为什么存在谣言，大抵有以下原因。一是核心和关键事实供给不足。如果民众对一些核心关切信息得不到有效供给，会造成民众心理恐慌，心理恐慌会产生信息不安全感，致使谣言乘虚而入，并因为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而成为民众的刻板印象，主流媒体传播的真实信息便会弃置一旁。二是焦虑、恐慌、无聊或其他负向心理激发，在传播学中效果最明显的诉求方式就是恐怖诉求，这种诉求不仅可以改变民众的态度认知，甚至直接促使民众进行线下集群行为，如新冠肺炎疫情刚出现时，社会上充斥各种谣言，主要是新冠肺炎会危及民众基本生存权，民众的恐慌可想而知，再加上隔离在家，空闲时间较多，为谣言滋生提供了传播环境。三是谣言有时被作为某些特殊群体的一种宣泄和抗议，很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谣言是某些特殊群体制造出来的一种社会抗争行为，能帮助他们消除焦虑、获得平静，是缺乏信息者对信息资源不平等的一种挑战。正是因为谣言产生与传播有着这样的复杂原因，对谣言治理就不能简单地一堵了之，必须对症下药，切实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有效治理。

分类管理，疏控结合，以疏为主。要创新治理思维，合理甄别不同类别和不同程度谣言的危害，构建“堵”与“疏”相结合的治理体系：一是持续供给事实，用鲜活的事实而非简单空洞的口号、评论或抒情填补动态的信息真空；二是及时发布客观、统一的权威信息，避免将新闻发布会开成各方各持己见的“学术研讨会”“学术争鸣会”；三是全面、准确、真切回应公众关切，很多时候谣言传播不同于一般网络舆情事件，不做回应的“主动发布”难以设置议程，反而容易造成“宣传的空转”；四是关怀具体人的处境和命运，既要在新闻传播中传递官方的权威声音和解决方案，也要将镜头、笔头触及个人、家庭和特定人群的命运，切忌空洞泛泛的宣传，要传播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真情实感；五是唤起积极社会心理，倡导公众有所参与、有所建设、有所作为，目的是减少“无事生非”。以上分类管理，用力于疏，周延于控。

化被动为主动，推动治理关口前置化。一是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鉴别谣言信源的唯一性进行有效锁定。谣言与真实信息在信源上最大的区别就是信源具有唯一性。因此，可以通过大数据回溯技术，有效甄别谣言并对传播节点进行识别和控制。二是充分利用谣言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传播的时滞性。谣言传播从宏观传播上看，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从核心人群向边缘人群传播，这个时间间隔大约1—3天，因此网络谣言需要抓住这个传播时滞周期，及早切断传播路径，实现谣言预警的主动性。

政内容识别为身份识别，增强受众识别能力。一是加强微信公众号的身份标识分类。加强公众号主体的官方认证的显著标识，并将之作为一种识别谣言的科普性知识对受众进行推广。二是加强强言易感人群和网络信息搬运工群体的识别和引导。谣言的易感人群是最主要的信谣者，很容易成为谣言的受害者和二次传播者，应强化对这类人群的识别和针对性辟谣；在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存在一群进行信息搬运的人群，这类人群是最主要的传播者，可以通过其在微信群的发言频度和信息类别进行有效甄别。三是鼓励各平台构建网络谣言数据库和按照信用分级的造谣者、传谣者和易感人群数据库。谣言治理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的治理，对人的治理要考虑针对性和精准化，按照谣言传播链条的角色和地位，可以将之分为造谣者、传谣者和易信谣者，对之进行传播信用等级评估，类似于征信体系，在账号主体明显的位置上予以标识，并对信用等级较低的账号进行预警，一旦用户

治理网络谣言必须对症下药

□ 李 彪



点开其传播的信息，将产生自动预警提示。

改各自为战为协同治理，构建社会化辟谣机制。一是改变单兵作战，构建谣言治理的多元责任主体平台。网络谣言的治理目前多是以平台企业和政府为主，社会第三方等资源介入其中的比例不高，未来需要由政府主导形成数据平台方、企业、专家、高校、政府等五位一体的多元责任主体平台，实现网络辟谣的社会化和无影灯效应。建立健全突发事件谣言研判联席机制，提高相关部门联席会商频率，创建“扁平化”的应急响应机制组织开展重大舆情会商、应对演练，确保关键时刻能形成合力。二是打通辟谣的数据平台，构建国家层级的谣言治理大数据平台。目前各社交平台和信息传播平台都有自己的辟谣频道和相关小程序，但各平台数据库还是相对割裂，尚未形成协同机制，需要在打通各个平台的前提下，在整个国家层面构建网络谣言大数据平台，融合网站、报纸、电台、电视、社会组织，建立融合新媒体、传统媒体的综合辟谣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成熟的谣言触发与预警机制。三是加强预防式科普宣传，注重方式方法的柔和度。加强日常的预防式科普宣传，尤其针对易感人群需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加强专业术语的“转译”能力，学会讲故事，避免简单粗暴的说教和告知，避免出现逆火效应（也叫“回旋镖效应”，当辟谣与人们已有的认知和信念相矛盾时，人们很可能会因此而更坚信先前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强化辟谣的情绪化引导，改变只重视谣言自身而忽略谣言背后的社会心理疏导和社会问题解决。